

睹书怀人

“我们是朋友”——追忆冯其庸先生

■刘咏

1月22日,农历的腊月二十五,著名文化学者、红学家冯其庸先生以93岁高龄离世,这个不幸的消息让我感到意外、悲痛。

就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下午,我带着刚刚印制完成、还飘着墨香的《瓜饭楼手抄(石头记)》,赶到北京通州冯老家。没想到的是,这次见面竟成了我们的永诀!

那天,冯老刚刚出院。我打开木匣,选了带朱批的一册给他,老人家看到书突然哽咽了,不断重复着“感谢”两个字。我的心情顿时沉重起来,跟冯老交往这么多年,老人家都是精神矍铄、谈笑风生,几年前《瓜饭楼从稿》定稿付印前,冯老还在青岛饮酒赋诗,也许这部手抄本承载了他太多的记忆与情感,也许冯老把这套书的世当做一次相隔50年的会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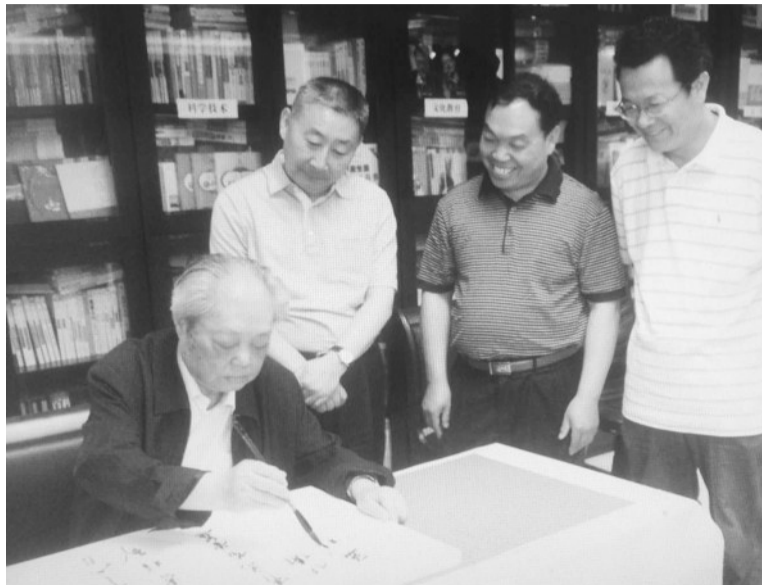
2009年夏天,在外出差的我接到董社长孟鸣飞的电话,让我马上赶到北京,说总编辑领导要给我们引见冯其庸先生,冯先生有一套大书有意让我们出版,当时很激动也很忐忑,连夜查阅资料做功课。见到冯老,他和蔼可亲地与我们攀谈了一会儿,就很快答应了我们正式签约。事后,我从《大众日报》记者逢春阶采访冯老的文章里知道了冯老为什么如此爽快选择青岛出版社的答案,冯老说:开始人家劝我不要到青岛出版社,意思是青岛出版社是个地方出版社,小出版社。我是不讲这些的,我就说,我是无锡农村的,我那农村比青岛小得多啊,什么大和小的问题啊。我们这次合作比较成功,关键是出版社的孟总,有远见,能办事。拿到这部稿子后,他们非常重视,也不计较鸡毛蒜皮的事。大家一说就成,自始至终,一直是非常融洽。

当时,我们拿到这部沉甸甸的35卷《瓜饭楼从稿》,压力可想而知。回到社里我们立即成立编辑项

目组,《从稿》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出版委员会,冯先生给我们推荐了著名编辑专家柴剑虹先生做我们的编辑顾问。犹如董事长孟鸣飞鼓励我那样,冯先生把他一生的著述成果交给我们出版,是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也是我们的荣耀,在我们编辑生涯里能编冯先生著述更是编辑们的幸运。

冯老学问博大精深,《从稿》分文集、评批集、辑校集三大部分,1700多万字,内容丰富,体例繁复,且写作时间跨度长,既有以考论《红楼梦》及其作者曹雪芹家世为重点的史学研究论著、目录,大量叙人记事、抒情感怀的散文、诗词和随笔类文章,以及中国古代文学史讲稿,又有对《红楼梦》几种主要版本的精彩而详细的重校评批巨著,还有辑校、考订、笺证其他古籍的学术成果。此外,由于冯老历来强调实地考察,重视图像资料,与文字相得益彰的近2000张珍贵图片也成为《从稿》的一大特色。全书既有简体横排,也有繁体竖排,随之也必然带来了全图形式、体例上的复杂多样性。如何确定编排原则,使之既遵循学术规范,遵守相关语法规则,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就成为做书过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必须考虑和应对的问题。

冯老似乎感到了我们的压力,2010年,年近90高龄的冯老来到青岛出版社,第一件事就是见编辑们,与编辑们谈治学、谈人生经历,讨论文集编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大家把编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他老人家一一沟通,大到体例、结构、版式、封面,细至字句斟酌、图片增删、标点使用,冯老都不惮繁琐,提出意见。编辑们提出的一些与现行编校规范不一致的词组用法,冯老和大家一起逐一分析,讲这些用法的出处与典故,讲“既要符合规范,又要



2010年,冯其庸先生在青岛出版集团

顾中国语言文字表达的丰富性”“要保留当时历史背景下文字的原初状态”等等。冯老还把自己的电话告诉每一位编辑,让他们遇到问题随时沟通。记得当时每改一遍清样,我们都把遇到的疑问集中起来请教柴剑虹先生,再把几箱的清样送到冯老那里,他会为每一卷文字进行审阅。记得文集里有两卷是《中国文学史稿》,原稿是依据冯老上世纪50年代的一个蜡版刻印的稿子整理重新排版的,因字迹不清校对带来很大难度,我们校对了儿遍,冯老一直感觉尚欠火候。后来,我们调整了另一位老编辑对稿子进行重新编校,冯老看到清样后高兴地给我电话:你们这几位编辑把很多问题看出来,很好啊,我到青岛要见你们。

这种融洽的交流让我们与冯老渐渐熟悉起来。冯先生出身贫寒,自小就深知人生勤奋耕耘的重要,

不论是作为耕耘之童,还是厕所学术之伍,他的勤奋保持了一生。他涉猎广泛,成就斐然,兼及文献、文学、红学、书法、摄影、绘画、考古、戏曲等等。他的一生是耕耘的一生,也是收获的一生。

在编辑冯老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冯先生很多著述是夜以继日写成的,而且有的是在旅途中构思动笔,他的诗画创作则是在学术研究的间隙进行的。冯先生的大学室友老冯跟我们说:“老先生是个闲不住的人,90多岁了依旧是天天工作到深夜,天天有干不完的事”。

2011年秋天,浩大的文集编辑工程即将完成,冯老决定再次到青岛看望文集的编辑付出辛劳的编辑们。记得那天晚冯老喝了一小瓶我们青岛产的71度琅琊台白酒,还即兴赋诗:“碧海蓝天作远游,岛青人好似逐秋。感君意气浓于酒,小烧琅琊不及酬。”冯老解释说,按

说青岛距北京并不远,但对我这个年龄来说,这就是远游啦。席间,我们敬冯老酒,祝贺《从稿》付梓,一旁的夏老师让他少喝,他老人家兴致不减,郑重其事地说,这酒不能马虎,这酒要喝……

回京不久,老人家还把这首诗写成书法条幅送给我们。后来的每次见面,他老人家总是说:“我选你们是对的,你们集团是有担当有眼光的,你们不是生意人,这在现在真是太难得了。”2012年《瓜饭楼从稿》出版后,冯老又把《从稿》的单辑、单卷的版权签给了我们,并一再表示版权由我们定,他不提要求。2015年上半年我们把《从稿》的单辑、单卷全部出版。

2015年10月,冯老将他50年前手抄的庚辰本《石头记》郑重交由我们出版,他老人家跟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关于这个抄本的故事,并写了两篇文章交给我,我明白,这是冯老一部“压箱底”的作品,他是要托付给信任的人去出版。

1966年“文革”之初,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冯其庸先生成为首批被批斗对象,他收藏的影印本《庚辰本石头记》也被抄走。冯先生担心浩劫中这个珍贵抄本将会灰飞烟灭,红学研究之脉有断绝之虞。思前想后,他决定照原样再抄一部!在那种境况下,这是相当大胆而又危险的决断。当时只有晚上才允许学生回家,他想法托好友秘密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天深夜等家人入睡后,即开始严格按照原稿格式逐字抄写。从1967年12月开始,到1968年6月抄毕,整整抄了7个月。为防再次被抄家,冯先生将自己的抄本转给妥实的朋友保管,直到“文革”结束才完璧取回。

虽然庚辰本《石头记》原本在“文革”中逃过一劫,未遭损毁,而冯先生的这个抄本却依旧有其特殊的内涵和价值。一位文史研究学者在

那样一种险恶的境遇之中,为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在深夜秉烛疾书,完成一部洋洋80万字名著的抄本,这在《红楼梦》研究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冯抄本”承载着一位红学家的爱国情怀与文化担当。

冯老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红学研究大家,在书法绘画创作上尤有相当精深的造诣。他认为书法要从学问中来,诗境中来。冯先生的小楷有深厚功底,从他这部《石头记》抄本的书法风格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前边部分有明显的晋唐书风,后来转为他较为熟练的宋徽宗小楷风格,再后来则变为书写较为快速流畅的行书小楷。书法风格也与当时的环境、心境密切相联。这一切,都构成了这个抄本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回想从编辑出版《瓜饭楼从稿》至今8年时间,我们多少次奔波于北京、上海、扬州、常州,多少次与冯老交流、向冯老请教,这是我编辑生涯里无比充实的一段时光,也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编辑这个职业的内涵,编辑工作让我们走近文化的高峰,是最好的学习,是最好的人生修行。

现在,我们仍保存着《瓜饭楼从稿》35卷的近10次编校清样,整整两大书橱,每遍清样都记录着冯老、文集编委会成员以及编辑们的编校痕迹,这是我们出版社存之久远的财富。

1月11日下午,集团董事长孟鸣飞再次到北京看望冯老,冯先生紧紧握着董社长的手说:“我跟你们已经不仅仅是出版社与作者的关系,我们是朋友!”这句话是那样质朴,却又那么令人动容。是啊,冯老,无论是作为一家出版机构,还是作为您的朋友,我们还有很多该好的选题没来得及出版,把您老留下的巨大而丰盛的文化财富整理出版好,应该是对您老最好的怀念吧。

学术前线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勾勒出“最初的中国”

——几种关于“中国”的论著读后

■陈民镇

“中国”最近很热。

近年来,文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知名学者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一批冠名“中国”的论著。其中,许宏、何舜、韩建业、李新伟、李零等考古学背景出身的学者的讨论颇引人注目。继“文明”“文化”“文明标准”“国家”等概念的讨论热潮之后,“中国”成为新的热点,这与21世纪以来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注重整合与总结的特点息息相关。这也正呼应了张光直先生在《论中国文明起源》中的设想:“谈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第一步是决定‘文明’该如何界定,下一步便要决定什么是‘中国’文明。”论证何为“中国”,所设定的倾听对象不独限于国人,更在于世界。

正如韩建业先生在《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一词在研究早期中国的论著中多见,但学者对其涵义及演变却鲜有措意。韩先生试图从考古学文化、古史传说、人地关系等角度全面考察“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并认为文化意义上的“中国”要追溯到“庙底沟时代”(公元前4000年前后)。与此不同,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先生认为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公元前1750年~前1520年),在其《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三联书店2014年版)中多有阐发。而陶寺考古队长何舜先生则认为陶寺才是“最早的中国”(公元前2300~前1800年)。李零先生强调“中国”的成立,不但有“中”而且要有“国”。按此标准,将“中国”追溯到“龙山时代”的陶寺,或许更近事实。

韩建业、李新伟两位先生更注重“中国”形成的历史背景。李新伟先生近来在《文物》《考古》《光明日报》《读书》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试图以“上层远距离交流网”说明新石器时代精神文化的交流现象。李先生这方面的认识,要追溯到2004年发表的《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一文,在此前刘国祥等先生也提出过类似看法。李先生从人类学的线索出发,试图以社会上层的亲身旅行说明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等文化之间的远距离交流,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

李新伟先生敏锐地注意到新石器时代不同区系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同”,也强调“上层”的特殊意义。“同”可能是文化交流的结果,这也是传播论者最热衷解释的途

径。但“同”未必说明一定存在文化的传播现象,平行比较也是一个思考的角度。至于“上层”,强调“大传统”与精神文化,跳出了考古学研究所倚重的一般陶器,这确是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思考维度。

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如果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似因素出现有先后,那么结合其他文化交流的线索则可以大致推断谁传给谁的关系。而若时代相当,文化交流的线索又不清晰,那么孰先孰后、孰为源头便难以遽断。至于空间的关系,则涉及地理背景。无论是许宏先生的《何以中国》、韩建业先生的《早期中国》,还是李零先生最近的《我们的中国》,在讨论“中国”时均极强调地理的要素。笔者一直以来密切关注“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研究进展,发现李新伟先生指出的典型远距离交流现象,大多分布于从长江沿线至东部沿海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空间特点值得重视。近来在《我们的中国》中读到李零先生明确提出中国有两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受鼓舞,以下试作阐述。

我们知道,童恩正先生——这位才华横溢的考古学家兼科幻作家,曾在《试论我国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一文中提出著名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道传播带,实际上由长城地带和藏彝走廊两部分组成,笔者拟称为“长城—藏彝”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而另一道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笔者则关注不足。李零先生在《茫茫禹迹·两次大一统》中指出:

童恩正讲,中国大地,从东北到西南,有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是讲中国的西北和西南,即中国的高地。其实,中国的沿海,也是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同样值得重视。

两个半月形地带:高地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戎、狄文化;沿海的半月形地带,主要是夷、越文化。北中国海,渤海和东海,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是夷的天下;南中国海,黄海和南海,从浙江到越南,是越的天下。

这两条弧线,画出一个大圆,中间是中国核心区。天下辐辏,各种族群都往里跑,有如漩涡,有些被吸进去,有些被甩出来。吸进去,变成华夏;甩出来,变成蛮夷。(第23—24页)

李零先生所说的沿海半月形

文化传播带以海岸线为根据,笔者则强调“长江—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与李先生的理解不尽相同。“大传统”与精神文化,跳出了考古学研究所倚重的一般陶器,这确是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的重要思考维度。在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时间与空间的因素。如果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似因素出现有先后,那么结合其他文化交流的线索则可以大致推断谁传给谁的关系。而若时代相当,文化交流的线索又不清晰,那么孰先孰后、孰为源头便难以遽断。至于空间的关系,则涉及地理背景。无论是许宏先生的《何以中国》、韩建业先生的《早期中国》,还是李零先生最近的《我们的中国》,在讨论“中国”时均极强调地理的要素。笔者一直以来密切关注“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研究进展,发现李新伟先生指出的典型远距离交流现象,大多分布于从长江沿线至东部沿海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这一空间特点值得重视。近来在《我们的中国》中读到李零先生明确提出中国有两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大受鼓舞,以下试作阐述。

不久前童恩正先生已经注意到早期中国文化二分或三分的现象,如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苏秉琦先生“面向内陆”“面向海洋”两大板块说,严文明先生的鼎文化区、鬲文化区、筒形罐文化区三大文化区,以及韩建业的东方、中原、北方三模式。

笔者并不希望以文化圈、文化区之类的概念以及机械、单线的传播论来讨论史前的文化,而试图以地理为基础,从两大文化传播带的互动与辐射出发勾勒出更为立体的文化交流图景,强调传播带所奠基的文化底色。两大传播带有两个交汇点,一在东北,这一区域的文化与族群结构兼有两大传播带的特征;一在西南,这一区域的文化与族群结构至今仍有很深的两大传播带相交融的烙印。两大传播带各自向外辐射,一面面向内陆与草原,一面面向海洋,分别奠定了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它们又同时影响中原,两大传播带所闭合的空间便是中原地区,即狭义的“中国”。

“长城—藏彝”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已有不少学者讨论,以下试结合近年来分子人类学、考古学等方面的新认识,重点讨论“长江—沿海”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就族群结构而言,“长江—沿海”传播带影响的人群主要有苗瑶语系、壮侗语系的族群。苗瑶语系的族群源自古代的苗蛮集团,在今天则体现为苗、瑶、畲诸族,他们分布于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壮侗语系的族群源自古代的百越集团,在今天则体现为壮、侗、傣、黎、水诸族。根据分子人类学的研究,百越集团的Y染色体DNA单倍型O1—M119为特征,具有这一遗传特征的人群,孕育于华南的北部湾

地区,后来沿海岸线北上扩张至江浙、山东、东北。东部沿海的先民,既包括越,也包括夷,夷越有密切的联系,可以统称为“夷越”。环太平洋地区南岛语系的族群,与壮侗语系的族群亦有同源联系,除了遗传学的线索,尚有语言学、考古学的佐证。玉器、有段石斧、文身、鸟图腾崇拜、人工拔牙、枕骨变形、口含石球等特征,见诸夷越族群乃至环太平洋的南岛语系族群。壮侗语系、南岛语系的族群,又可以统称为“澳泰族群”,这方面,生命科学领域的李辉等先生已经从遗传学的角度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长江—沿海”传播带所辐射的范围,相当于苏秉琦先生所称的“面向海洋”板块,亦大致相当于严文明先生所称的鼎文化区、韩建业的东方模式。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于华南、华北、东北,主要在“长江—沿海”传播带的辐射范围。而“长城—藏彝”传播带的新石器文化则起步较迟,中石器时代的文化延续了较长时间。作为新石器文化的重要标志,陶器最早出现于华南,其他地区的陶器出现稍晚,并且有受华南陶器影响的迹象。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浙江的上山文化与东北的兴隆二期文化均出现豆类圈足器,这可能追溯到约万年以前。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发生与发展或存在这样的线索:发轫于华南,随后向北扩散至东部沿海、中原乃至东北。这与分子人类学所揭示的O1—M119人群的迁徙路径有相合之处。活跃于江淮海滨的夷越民族或许相对早慧,他们的辛勤创造奠定了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基础。

“长江—沿海”传播带以长江下游为节点,可以大致分为长江沿线与东部沿海两部分。该传播带的文化交流,韩建业先生在《早期中国》中已有不少涉及。新石器时代中期以降,长江沿线的文化交流日趋密切。长江中游至下游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稻作农业,有一致的生产基础。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跨湖桥文化,与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马家浜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也沿着“长江—沿海”传播带分布。至于太阳、鸟、龙、龟等天体及神灵动物的崇拜,广泛分布于“长江—沿海”传播带,体现出先民精神世界的共性。

最为奇妙的莫过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共见因素,这也是李新伟先生最为强调的。一者在东北地区,一者在长江下游,相隔一千多公里,却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玉人、玉龙、玉龟、双联璧、鳖形器、石钺等器物。张明华、田名利、韩建业等先生认为这是红山文化南下影响所致,朱乃诚先生认为凌家滩文化向北影响了红山文化,李新伟先生则以社会上层的亲身旅行游学来解释。笔者以为,若置诸“长江—沿海”传播带的视野,将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最典型的莫过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出土有手斧(很可能是与宗教有关)相同的玉人,可以说出奇的相似。张明华、郭大顺、王仁湘等先生还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到了李新伟先生所未提及的多件台湾原住民木雕人像(乃至美洲印第安人创造的类似形象),姿态仍如出一辙。

O1—M119这一典型的夷越遗传特征,不但广泛见于长江下游,在红山文化的先民遗骸中也有发现(东北是两大传播带的交汇点),台湾原住民也有与越人一致的遗传结构。“长江—沿海”传播带视野下的文化交流,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共性,不能因为距离过远而否定其联系,也不能简单以传播论来解释。

李新伟先生的理论依据是: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具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但他所列举的例证,多与原始宗教有关,而且在器形上并非单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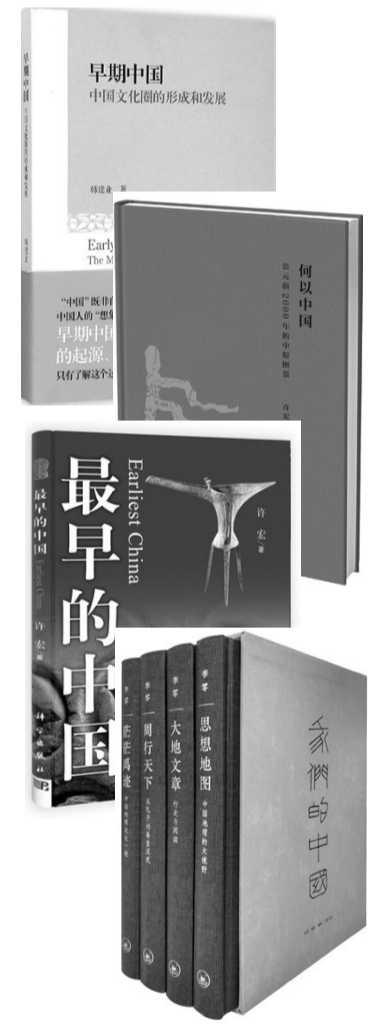
的文化交流。长江下游与黄河下游也有密切的互动,诸如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特殊关系已为人所熟知,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下游最终整合为“鼎一豆一壶一杯”系统,并且与东北的红山文化存在诸多共同因素。

精神文化的交流更为引人注目,这与“大传统”或者“上层远距离交流网”密切相关。如高庙文化的八角星纹沿着“长江—沿海”传播带向长江中下游、山东乃至东北传播,高庙文化的兽面纹也深刻影响了长江下游及黄河中下游的文化,成为后来商周饕餮纹的前身。玉琮这样的早期玉器,见诸兴隆洼文化、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溪文化,也沿着“长江—沿海”传播带分布。至于太阳、鸟、龙、龟等天体及神灵动物的崇拜,广泛分布于“长江—沿海”传播带,体现出先民精神世界的共性。

最为奇妙的莫过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的共见因素,这也是李新伟先生最为强调的。一者在东北地区,一者在长江下游,相隔一千多公里,却出现了极为相似的玉人、玉龙、玉龟、双联璧、鳖形器、石钺等器物。张明华、田名利、韩建业等先生认为这是红山文化南下影响所致,朱乃诚先生认为凌家滩文化向北影响了红山文化,李新伟先生则以社会上层的亲身旅行游学来解释。笔者以为,若置诸“长江—沿海”传播带的视野,将会得到更深刻的理解。最典型的莫过于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出土有手斧(很可能是与宗教有关)相同的玉人,可以说出奇的相似。张明华、郭大顺、王仁湘等先生还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到了李新伟先生所未提及的多件台湾原住民木雕人像(乃至美洲印第安人创造的类似形象),姿态仍如出一辙。

O1—M119这一典型的夷越遗传特征,不但广泛见于长江下游,在红山文化的先民遗骸中也有发现(东北是两大传播带的交汇点),台湾原住民也有与越人一致的遗传结构。“长江—沿海”传播带视野下的文化交流,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共性,不能因为距离过远而否定其联系,也不能简单以传播论来解释。

李新伟先生的理论依据是: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具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但他所列举的例证,多与原始宗教有关,而且在器形上并非单纯



近年出版的几种关于“中国”的著作

的模仿、借鉴,而是出自共通的精神旨趣。这些“长江—沿海”传播带的相似文化因素,很可能植于夷越族群的常见精神信仰。它们沉淀于文化底层,未必是通过文化交流、借鉴产生的。

“龙山时代”无疑是“中国”形成的重要阶段。“长江—沿海”传播带的文化因素大量涌入山西襄汾的陶寺,直接刺激了这座大型城邑的崛起,中原地区自此奠定“中国”的基础。陶寺所在的山西襄汾,古称“平阳”,相传为尧的都城。清华简《保训》记载,尧因舜“求中”“得中”而禅位。如若按李零先生“中”“国”兼备的标志,陶寺确乎可以说是“最早的中国”。

陶寺文化晚期遭到“长城—藏彝”传播带文化因素的大规模渗透,中原地区经历了又一次新的洗牌。在此契机下,大量域外文化因素涌入中原,一个经过重铸的“中国”已然呼之欲出。两大文化传播带因而经历更多的碰撞,陶寺便是重要的中介。“中国”的成立,不独在于其汇聚周边文化,更在于重新整合后的文化能够辐射四方。这一点,后来的二里头显然向世界展现出了更为壮阔的图景。